

当代修辞学与 解释学读本

[美] 沃尔特·约斯特 编
[美] 迈克尔·J. 海德

黄旺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当代修辞学与 解释学读本

[美] 沃尔特·约斯特 编
[美] 迈克尔·J. 海德

黄旺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修辞学与解释学读本 / (美)沃尔特·约斯特,
(美)迈克尔·J. 海德编;黄旺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8

ISBN 978-7-100-15396-6

I. ①当… II. ①沃… ②迈… ③黄… III. ①修辞学
②阐释学 IV. ①H05②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272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当代修辞学与解释学读本

〔美〕 沃尔特·约斯特 编
迈克尔·J. 海德
黄 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396-6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3 1/4

定价:85.00 元

Walter Jost, Michael J. Hyde

RHETORIC AND HERMENEUTICS IN OUR TIME: A READER

Copyright © 1997 by Yale University.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8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英文版译出

语词基于句子上下文而具有意义。句子基于语言上下文而具有意义。语言基于生活形式的上下文而具有意义。生活形式基于世界的上下文而具有意义。世界基于语词的上下文而具有意义。

——斯坦利·卡维尔，《〈瓦尔登湖〉的意义》

前 言

本世纪中叶，库尔提乌斯在具有权威性的《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拉丁文学》^{xi}中谈到修辞学学习，他不仅大胆地宣称修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目，已经长期从课程表中消失”，而且宣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修辞学没有一席之地”。^①仅仅几年之后，牛津的学者 C. S. 刘易斯表达了类似的感想。刘易斯的一个身份是文艺复兴专家，在他看来，修辞学作为学习科目在现代被遗忘，为我们正确地进入远古文学制造了最大的障碍。^②对刘易斯和库尔提乌斯来说，修辞论题（topoi）、讲话类别、风格的层次和类型等事物构成的古老体系很久以来就“渗透了所有文学类型”，成为欧洲文学的“公分母”（ELLM 70），甚至成为它特定的基础（被许多人轻视地看作“地下室” ELLM 79），而要鉴赏西方文学遗产就必须理解它的古典和中世纪资源。当然，库尔提乌斯和刘易斯都没有寻求重新引入作为一个独立大学职业的修辞学，尽管两人作为文学史家，都熟知修辞学在历史上曾一度对人文科目发挥了普遍的影响。然而，在修辞学的古钱币依然被少数有见识的人们所珍视的同时，它本身被大多数 xii

① E. R. Curtius, 《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拉丁文学》(*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rpt. 1990, 第 62 页。下文将简作 ELLM。

② C. S. Lewis, 《16 世纪英国文学》(*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第 61 页。

人认为早就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不受人注意、不起作用、特别是时代错置了的东西——也就是说，脱离了属于它的那个时代。

在库尔提乌斯做出这一评价半个世纪之后，修辞学的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以致另一个文艺复兴学者理查德·兰纳姆注意到“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修辞学已经从我们理智聚焦的边缘走向了核心”。^①修辞学与我们将要熟悉的作为阐释的技艺（或者说，与解释学）一起，使我们对关于理解和领会的新模式的崭新理解得以可能，使熟悉与陌生文本之间的交流得以可能，后者跨越我们智性的藩篱，使我们进入异域文学、进入新的课目和革新着的经典。因此，本书的标题可以被看作是画蛇添足，因为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在其中修辞学和解释学已经迈过学术的地平线而有了相类似的影响和势头（虽然人们并不总是乐意承认这一点）。的确，考虑到大量社会、文化、智性和经济的冲突对现代和后现代的影响，说这两个学科本应激起并不断激起如此广泛而多样的反响，这并不会使人们感到太惊奇。毕竟，修辞学和解释学的繁荣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在各种阐释和观点的冲突的基础上——正是这些冲突使学界内外的每个事业领域活跃起来。此外，它们也是在实际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才得以繁荣的，对于后者，某些人以怀疑和抵制的态度看待它，而另一些人则接纳它——当然，充满了忧虑，但也充满了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说的“惊奇的永恒冲动”。^②本书的目标是致力于向初学者以及专家表明当代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一些版本的基本面貌，并且指出这两者如何可以放在一起思考，因为每个不仅预设，而且同时扩展和修正了另一个。

① Richard Lanham,《电子语词：民主、技术和艺术》（*The Electronic Word: Democrac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第71页。

② Richard Bernstein,《新星座：现代/后现代的伦理政治视域》（*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第28页。

尽管在专著和期刊上人们对这两者的定义和范围的精细讨论如雨后天晴般出现，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在同时对修辞学和解释学感兴趣的思想家之间发起过对话。这种对话寻求阐明两者的关联和分道扬镳之处，弄清楚它们的共同原则、问题和目标，乃至它们彼此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今天，解释学已经以多样的方式成为一个哲学、文学和批评的难题。它同时是广义上被理解的方法问题（解释学的现象学，读者－反应批评）、追求真理的哲学问题（人所具有的阐释本质）、同时以怀疑的姿态抵制方法和真理的问题（关于存在、语言、自身等的认识论动荡，或者对我们交往活动中的系统化威胁和意识形态扭曲的揭露）。^①解释学并不总是支配着这些领域；xiii
解释学首先是从圣经的解经事业发展而来（如让·格朗丹指出的，以非目的论的方式），^②这一关注最初扩展到圣经外的所有文本，然后在所谓的人文科学中扩展到理解的所有问题，最终达到对理解和解释本身的哲学关注。这些方法论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发展历经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主要由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威廉·狄尔泰、弗里德里希·尼采、马丁·海德格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完成，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回应伊曼纽尔·康德、黑格尔和埃德蒙德·胡塞尔等人的哲学总体化（totalizations）倾向。在占有了这个传统的某些内容并纠正了它的若干错误后，当代解释

① 有许多广泛适用的跨学科的解释学选集或文集；大部分都附有有用的文献目录。对解释学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的有益的概要，读者可参看杰拉尔德·布伦斯，《古今解释学》（*Hermeneutics Ancient and Moder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 170-228 页。一些侧重文学方面的运用，参看 William V. Spanos 编：《马丁·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走向后现代文学解释学》（*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 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ry Hermeneutic*），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第 3 页。

学不仅为哲学而且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革命性的方向，而且，在我们看来，它为我们许诺了进一步的洞见力和可能性，特别是当它与修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被讨论时。

关于修辞学，库尔提乌斯再一次（以学术上轻描淡写的方式）指出，“德国人似乎对它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ELLM 62）——这一评价很好地把握了康德和黑格尔对修辞学主题和比喻（tropes）的轻视，但在涉及伽达默尔后期对两个学科之间广阔的共同地基的承认时，这个论断就不那么恰当。伽达默尔说：“我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是解释学和修辞学共享的领域：令人信服的论辩的领域（它不同于逻辑上的强制性）。它是实践和人文科学的一般领域。”^①伽达默尔这里所提到的实践和人文科学的一般领域，暗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这一真正让人望而却步的领地。然而，它是这样一个领域，其范围完全与罗马和文艺复兴的修辞概念一致，而且也越来越与解释学的哲学、文学和批评的概念范围相一致，它提醒我们修辞学和解释学都不曾能作为严格的壁垒森严的课题。毋宁说，两者本质上都是跨学科的努力，这一努力的最富创造性的工作可能不是在我们的过去，而是在今天和未来，特别是在修辞学和解释学作为相互构造着的事业得到越来越好的理解时。

对如本书这样的著作感兴趣的大多数读者都会肯定修辞学和解释学对于人类实践的核心地位。但他们也会承认，要确定这些冲突的概念的确切含义存在许多困难。作为编辑者，我们一方面努力避免给这些概念以独断的定义，另一方面也避免过于松散地使用这些

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Tübingen: J. C. B. Mohr, 1960；《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第二版修订本，New York: Continuum, 1993，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编译，第568页。关于修辞学研究的有益的参考书目，参见 Winifred Brynat Horner 编，《历史与当代修辞学中的学术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Scholarship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Rhetor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0，修订版。

概念。我们并不假设我们的读者是每个领域的专家，也不假设他们能够或应该被期望对如何最恰当地定义修辞学或解释学达成一致（本书的作者们也不能做到这点！）。事实上，在这两门学科的更完善形式中，两学科自身就否定了这种想要达成一致的企图。我们实际 xiv 上把两者的术语都用作发明的修辞学论题（topics）——也即，作为思想史上不确定的概念，并且这些使用能被用于暗示探究的新引线。这种开放性避免了哲学上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做无根据的本体化或具体化，也避免径直地把一个术语等同于另一个术语。

的确，即使这些公开使用或援引这两个学科及其历史的神学家（如施莱尔马赫、布尔特曼）、哲学家和批判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拉康、福柯），以及更加“文学性”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克尔凯郭尔、尼采、伯克、德里达、德·曼）也不能提供关于这两个学科的具体内涵及它们如何可以被放在一起思考等问题的现成答案。例如，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所有修辞学或公共演说，“所有的说服、讨价还价和通过本人自身获得的直接注意”，^①都无一例外被丢到公共舆论和操纵的垃圾堆——换言之，都受到迎合取悦大众这一古老指责。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的全部著作中，人们发现了有关间接交流和作为主观性的真理的精细而深思熟虑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如果不是在名义上，克尔凯郭尔热烈地拥抱了修辞学的说服和解释学的阐释。从历史上看，这一情况以及与之类似的使人迷惑的策略导致我们对这两个学科的叙述是复杂乃至支离破碎的，这一复杂性无法被我们的论文所（也许应该）致力于的齐整利落的概述所涵盖。然而，作为更加贴近地以总论（或实用主义）的方式规定这两个概念的方式，我们这一做法为说明修辞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

① 克尔凯郭尔，《非科学的最后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David F. Swenson and Walter Lowrie 译，第 221 页。

如何被掩盖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考线索。因为本书的标题指向修辞学和解释学中时间（和时机 [timing]）的重要性，因此让我们简要地转向海德格尔对时间的阐述，（作为一种方式）它可以揭示把修辞学和解释学放在一起思考所具有的优点，这种好处是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

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一书中，希欧多尔·克兹尔重述了近十二年间海德格尔哲学如何步步突破，直至形成新的时间概念。这一新的解释不仅使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整个先验分析系统化，而且给出了基础；^①克兹尔恢复了海德格尔 1922—1923 年的术语，将它定名为“存在的时机论”（Kairolology）。^②

正如哲学解释学的学生们所熟悉的，海德格尔的深刻创新挑战了我们日常作为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hronos）的时间观念的自足性，后者是似乎永不停息地融入过去和未来的精确“当下”的严格序列。海德格尔与之形成尖锐的对比，他把时间性揭示为人的特定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揭示为作为操心（Sorge）的人的存在论结构——这使得我们能够去响应（或毋宁说去朝向）我们自己的可能性。这一构想中的“朝向”（toward）意指在海德格尔时间性解释中，在与任何神话虚构中严丝合缝的当下相对时，未来在存在论上所具有的优先性；它是构成了我们的“期待”，激活了我们对过去的持续“重演”——或用伽达默尔和利科的术语说，“占有”——的未来的可能性。以此方式，我们的当下总已经（源始地）在可能性的筹划中被赋予了过去和未来的向度。因此克兹尔说：“专注于契机（moment）的时间，这一新的与不同意义上的时间，同时是我独一无二的生命时间。以何种方式？通过‘同时’（同样原初地）预示我死亡的可能性和重复我

① Dasein 是海德格尔严格界定了的重要的术语，但在此我们把它视作“人”。

② Theodore Kisiel,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第 421 页。

诞生（遗传、继承、遗产）的可能性。”^①因此，作为时机（*kairos*）的时间或“时间性”，不是作为一往无前的前进，而是作为理解和操心的自我占有的循环”。海德格尔主要从早期基督教对“时候到了（fullness of time）——作为一个生存的而非中立或客观地被给予的瞬间的再临（the Second Coming）——的关注那里引申出这个时机概念。

现在，这里的关键在于，隐藏在克兹尔对海德格尔之存在的时机论说明中的是这样的事实：如修辞学的学生所熟知的，“时机”是源自前苏格拉底时期戏剧、哲学、演说，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及〔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高尔吉亚那里的古老修辞学概念。在希腊戏剧和文学中，时机包含多种含义：简短、比例或适度（如同赫西俄德所说：“遵守好的尺度和比例〔*kairos*〕是所有事情中最好的事情”），与契机（moment）、权宜（expedient）、有效、正确或适当等匹配。^②在后来的修辞学理论中，*Kairos*〔时机〕被阐述

① Theodore Kisiel,《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第438页。

② 参见 William H. Race,《希腊戏剧中的语词〔*Kairos*〕》（*The Word [Kairos] in Greek Drama*），载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Douglas E. Gerber 编, 第3卷（Chico, Calif.: Scholars Press, 1981），第197-213页。其他有益的作品包括 Mario Untersteiner,《智者》（*The Sophists*），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4, Kathleen Freeman 译；G. B. Kerferd,《智者派运动》（*The Sophistic Move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Jacqueline De Romilly,《古希腊的巫术和修辞》（*Magic and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以及《伯里克利雅典的伟大智者》（*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Janet Lloyd 译；Edward Schiappa,《普罗塔哥拉与逻各斯：希腊哲学与修辞学研究》（*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特别是第73-74页；Dale L. Sullivan,“时机与信念的修辞”，*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8（1992），第317-332页；以及 Eric E. White,《Kaironomia：论发明的意志》（*Kaironomia: On the Will-to-Invent*），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它在修辞学中的起源，*Kairos*并没有出现在 F.E. Peters 的历史辞典《希腊哲学术语》（*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中，因为它所高举的价值系列——时间，偶然性，发明适应观众和场合，说服——恰恰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家们所抵制的价值。

为“适合”(to prepon)、“得体(decorum)”(如在西塞罗那里),以及文艺复兴人文学者那里的 sprezzatura(优雅/轻松),这三者都包含了演说者在不依赖理论规则的情况下适应处境和听众的实际能力。^①然而,最初 Kairos(时机)指原则和力量(dunamis),通过它,恰当的契机要求演说者基于直觉的、恰当的回答(而不是演说者在对处境做了有意识评估之后所发起的一个行动)。它是一个与计算和逻辑不相容的发明或发现(heuresis)的力量,它在需要选择和行动的关键时刻,结束纠结着的逻辑(contending logoi)的静态状态。这样的 Kairos(时机)超出了演说者的控制,而是作为一个赠礼乃至作为魔力(goetia)而降临。总之,人们强调的是作为接受性的 Kairos(时机),在以后的理论发展中,它特别指向作为灵巧行为的适当(prepon)和得体。

无疑,克兹尔表明海德格尔自己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修辞学和 Kairos(时机)之间的关联,至少这个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出现时。然而,鉴于他追溯海德格尔思想的使命,鉴于在海德格尔的课程中或在他二十年代的著作中似乎从没有提到(例如)毕达哥拉斯或高尔吉亚,克兹尔不考虑他与这些思想家的可能联系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前苏格拉底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潜在有趣但未被注意到的亲密关系依然存在,尤其是考虑到海德格尔自己对良知召唤(在《存在与时间》中)以及语言和存在的召唤(在后期著作中)的“倾听”和听取的特别强调。这看起来与高尔吉亚对作为一种力量的修辞发明的强调类似,人们主要通过倾听和听到而非讲话来感

① 关于 sprezzatura, 参见 Victor Kahn, “人文主义与对理论的抵制”, 本书第七章。另参见 Lanham, 《电子语词》(Electronic Word), 第 148 页。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术语的分析, 可参见 Frank Kermode, 《终结感: 虚构理论中的研究》(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第 46-50 页。

受到这种力量。^①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切入点，我们顺理成章地获得一个视角，借此去衡量海德格尔如何有选择地（并且可能是无意识地）汲取 Kairos（时机）的修辞传统以滋养他自己的哲学解释学。然而，无论人们对后期海德格尔的异议是否正确——即一种寂静主义的被动性威胁并消除了实践 的思想和行动——一个积极的被动性与早期修辞学的“时机的”传统亲近，而与其后期疏远。随着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对“时机”学说的的发展——两人强调省略式三段论的或然性、市民责任、作为施动者的演说者、作为手段（agency）的论题，以及作为人的主动性（initiative）的发明——这一被动性减弱了。因此克兹尔（选择性地）强调：“几乎不同寻常地，在修辞学中海德格尔的兴趣向〔听〕倾斜，讲话以被听为终点。讲话在交流中，在被经历或‘遭受’讲话的听众的接受或认可中得以完成。一个似乎边缘化的论题，倾听者的‘遭受’和作为其结果的‘情感’（希腊语：pathos），现在成为了核心。”^②事实上，这一向听的倾斜重新恢复了高尔吉亚对修辞学和解释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尽管同时它冒着忽略修辞处境中讲话者的主动参与方面的危险。

因此，概而观之，并不完全显而易见的是，作为“时机”的时间解释学的修辞学回响表明，一些专家仅注意解释学而另一些专家仅注意修辞学的现象正在消失：也即，我们特定的在世界之中存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不可分割地既是解释学的，又是修辞学的，并且多层面的讲话和倾听构成了我们的处境。我们自己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相结合的时代，是低俗化和土崩瓦解的时代。但它也是一个对语言阐释做深入反思的时代，它将对下述事物加以反思：

① 在 Stanley Cavell 的《〈瓦尔登湖〉的意义》（*The Sense of Wald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expanded edition）一书中以有趣的方式追随了这一思想路径，第 88 页：“《瓦尔登湖》在其对倾听和回答的强调中，描画了良知的认识论的轮廓。”

② Kisiel,《起源》（*Genesis*），第 296-297 页。

说服、跨越范式或世界观的“转换”、宣传、有关欺骗和权力的那些更令人反感的形式，以及电子语词（electronic word）和新的多媒介的诸形式。因此，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其中我们需要同时去倾听和讨论伽达默尔所说的修辞学与解释学之间的“深入的内在交汇”。^① 大卫·特蕾西在本书中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现在看来很清楚，解释学家必须同时承认并研究修辞学理论，反之亦然。”^②

xvii 因此，人们反过来向这样一个时代提出的（适合于这个时代的），乃是这样的要求，即开拓辩论和讨论的新论题（topoi），开拓尚未被完全带到光线下的新关联和引申，这看来与本书编者和作者的意图一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形而上学》，1004b 17-27），而它的“对立面”修辞学，在其用论题去考察和规定一个既定内容时是探索的和“发明的”。对本书的许多撰稿者来说，目前紧迫的任务包括更具体地把（现代形式的）解释学确定为修辞学的对立面（以及反之），并且把这两者看作所有思维和语言的特征或维度，而不仅仅视作特殊的方法或政治实践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本书意图推动思考修辞学和解释学之关系的一般趋势，特别是提供一些路标，借此那些与一个学科具有共鸣的人能够通向并进入它的对立面。

此外本书还以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修辞学和解释学本身是高度时机性的（kairotic），也即是时间的、处境的和被动机引发的（motivated）事业。就此而言，我们通过本书各章节对这两个学科的占有本身就以两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受到限定和动机引发。第一，我们寻找在若干不同学科领域中工作的学者，并且我们自信已经做

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怀疑的解释学”，载《解释学：问题与展望》（*Hermeneutics: Questions and Prospects*），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4, Gary Shapiro and Alan Sica 编，第 55 页。

② David Tracy，“爱、模糊、清晰：奥古斯丁对修辞学和解释学的探索”，本书第 12 章。

了很好的安排，使得其章节呈现了我们今天所完成的那些最有趣和最富有启发性工作的一部分。第二，我们的编辑工作本身就是历史的，因而是时间性的，是我们自己的“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的产物，这一产物处于本书作者们自身彼此相异的遗产之后或之外。在导论和随后章节的选取中，我们对居于下述两者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持信任和认可态度，并受其引导：一者是所谓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另一者是镜像结构（mise en abîme），它被某些人断定为唯一替代选项，同时它受到修辞学对良心的关注和作为奠基的可能性的肯定，例如，在海德格尔和勒维纳斯那里，它作为诸位置的位置。在本书的选择和承诺的范围之内，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作者的阐释和论证的方式以及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本书这些章节恰恰在它们反思的时候，富有成效地思考了当代的当务之急。

当然，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时代”^{*}这一稳妥的术语有成为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的危险，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深层疑难的表达。有些人会问，哪些价值是与“我们”亲缘的，如果它并不直接、鲜明甚至专门地区分了被压制和边缘化的人、非西方人、被殖民者、妇女、儿童——简言之，他人——的特征的话？我们意识到，题目中的术语我们所指示的东西潜在地是吊诡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共同分享的、对我们而言是共通的东西，乃是我们的断裂和不可通

xviii

^{*} 本书的原书名为“Rhetoric and Hermeneutics in Our Time: A Reader”，直译为“我们时代的修辞学与解释学：一个读本”，为符合汉语表述习惯和简洁起见，转译为“当代修辞学与解释学读本”。——译者

自己及他们的读者。

事实上，沟通（bridging）这个隐喻被伽达默尔和其他人用作定义解释学：“解释学可以被定义为克服难以移情所导致的距离和不能轻易达成的一致而努力。总是存在需要被沟通的鸿沟。”^① 如果不那么形象地说，我们则愿意跟随杰拉尔德·布伦斯的有代表性的做法，他把解释学称为“有关人们在理解任何事物——不只是文本，也包括事物之如何——时所发生的诸问题的家族”。^② 这一改动不仅考虑到那些熟悉的解释学类型——作为“方法、哲学和批评”的解释学，也考虑到其历史表现的范围（古典、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代、后现代）。^③ 作为哲学，解释学不仅阐释人，而且作为阐释的理解，也阐释在其所有显现中的存在（揭示“作为的结构”，例如把某物看作某物，“视作”[seeing-as]）；解释学讨论超出人们把握的“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面貌，如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说，讨论不可能的客观主义和恶意的相对主义（尽管没有人曾确切地表明这是如何完成的）。作为方法，解释学整理编纂关于文本及类文本的阐释规则和程序，把伽达默尔对艺术作品的洞见转移到对历史和所有文本的理解中去。作为社会批判，解释学提供一种质疑所有信息的表层明显内容的方法；解释学要求能够监督其对真理的主张，从扭曲那里争取自由的可能性的最大化（尽管包含在诸如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中的那些问题很少被解决）。

跟随布伦斯，我们也能把修辞学思考为包含许多问题的一个家

① 伽达默尔，“怀疑解释学”，第57页。海德格尔对 Hermeneuein 的注释是：“带来消息的展示，因为它能够倾听信息”：Martin Heidegger，“与日本人的对话”，载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途》（*On the Way to Language*），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eter D.Hertz, 第29页。

② Gerald L. Bruns, “论解释学经验的悲剧”，本书第3章。

③ 参见 Josef Bleicher,《当代解释学：作为方法、哲学和批判的解释学》（*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as Method, Philosophy, and Critique*），London: Routledge, 1980。